

古有世说新语,今有师说新语,本版欢迎广大读者建言立说。



专科生到哪都投不出一份简历,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



大专生含泪,教育含悲

□ 张敬己

3月7日,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供需见面会在广东华南师范大学举行,一名大专女生因遭遇门槛歧视,向在场的教育厅官员含泪抱怨:“专科生到哪都投不出一份简历,难道大专生连去农村当教师都这么难吗?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

在各大网站该新闻的跟评里,多数与“就业歧视”和“关系才是‘第一生产力’”这类社会问题有关。只看文凭的“就业歧视”事实上存在,在都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情况下,选择本科毕业生也是一种相对无奈的办法。至于“关系才是‘第一生产力’”这种社会现象,那又另当别论。

就业形势难,其实还说出了一件事: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已经够多了。可相反的是,人才却并不多,甚至连学业稍有专长的有一定能力的大学毕业生,都很难找。面对如潮的大学毕业生,招聘单位却哀叹招不到想招的人。这就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学生学业素质普遍偏低,二是高等教育的内容已大部分与教育的社会功用宗旨脱节。

关于第一个问题,学风不正不是主要原因,“60分万岁”成主流趋势,甚至只要交足了学费,到时可领一张毕业证。到大学,目的直奔毕业证,就连重点大学的学生也不例外:小学到高中的努力,只是为了换取一张重点大学的门票——为了以后取得较大的就业优势而奋斗。虽然这不是全部,但至少是较普遍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即使大学生想学一些东西,除去朝“进研究所”这个方向努力的极个别别人以外(但社会对“进研究所”的人数需求却并不多),大学课程内容的设置,也使得想努力学习的大学生产生了迷惘——所学的东西不能与社会需求接轨,再加上就业形势的严峻,就业时专业不对口现象普遍化,于是很多大学生叹息:混个毕业证就得了。

所有的原因,最后都指向教育的产业化。产业化使大学成了大的学校,多数大学专注于教育产业的发展,学生的素质沦为第二追求目标,教育内容与社会功用的关系,更不是考量的内容了。所以,新闻中那名女大专生含泪追问“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这句才算是直抵核心。所以,教育的浅功利化,这只是责任追究中大学应付的表层责任。更多的问题,恐怕出在指导方针上。



范进因“中举”而发疯,杨盛敏因落榜而失魂落魄,虽“异曲”却“同工”,都折射出了“公务员考试”的巨大魔力

有多少“范进中举”还在重演

□ 乔志峰

因“公务员考试”发疯的最著名的案例,乃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范夫子考了半辈子,一朝中举吃上皇粮,兴奋过头顿时便“痰迷心窍”,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户一记油晃晃的大耳刮子才清醒过来。一直以来,范进都以反面典型的形象存在,饱受人们嘲弄。谁又想得到,时至今日,被分

配到广西三江做村官的大学毕业杨盛敏,在考公务员失败后发疯。父母为了避免杨盛敏伤人,不得已焊制铁笼,将他锁入囚禁了两个月,并给他的手脚带上锁链。

范进因“中举”而发疯,杨盛敏因落榜而失魂落魄,虽“异曲”而“同工”,都折射出了“公务员考试”的巨大魔力——或者鲤鱼跃龙门改变命运,或者考试失利一无是处,简直是“成王败寇”。

“公务员”如此多娇,引无数国

人竞折腰。为“公务员考试”发疯发狂者,又何必范进和杨盛敏呢?每次的公务员考试,都会上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壮观场面。就在3月15日,2009年度山东省公务员考试公共科目笔试举行,约有39万人参加考试,竞争8600多个岗位。几十万人竞争数千岗位,这是怎样的一种狂热!

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究竟“高”在何处?以前不甚明了,现在终于想通了——可

以考官!不要责怪现在的国人依然迷信“官本位”,只要附着在“官”(公务员)之上的诸多利益和特权存在着,就必然会有人为其疯狂。

本来是为公众服务的公务员,却拥有如此巨大的“利益含量”,显然是不正常的。而历经百年、千年,“公务员考试”引人疯狂的状况不仅没有改观,反倒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更不正常。



关注

儿童时期是一个对外界感知充满幻想和好奇的成长时期,当我们没有足够的、科学的、趣味的、知识的东西去满足他们那种摄猎时,他们自然会去自己摸索所需要的东西

少儿版“人民币”现身谁之过

怀化市党史研究室 杨必军

近日,国内各家媒体和网站相继报道少儿版“人民币”事件,这种面值与现行第五套人民币面值等额的小儿版“人民币”在校内流行让不少人唏嘘。此举除违反《银行法》有关条款以外,也当引起社会人沉思:这种标属“儿童玩具银行”的“儿童钞票”现身到底谁之过?

如果我们的儿童问题专家知晓我们的少儿需要什么类型的玩具,我们的正规厂家能够生产出健康的、经济的、趣味的、能够满足儿童心理需求的玩具出来,少儿版“人民币”会有市场?如果在此问题上一味地责怪“儿童钞票”制造者和出售商,未免有过之。

作为“儿童钞票”的制造商和销售者,他们既然能够摸透少儿的心理

需求,能够策划出儿童市场需要这么一种“儿童钞票”,恐怕也不是闭门造车、关门作文章那么简单,必定也是作了社会调查,作了市场可行性分析,否则不会做一项毫无胜算的投资去开拓存在风险的新市场。

儿童时期是一个对外界感知充满幻想和好奇的成长时期,当我们没有足够的、科学的、趣味的、知识的东西去满足他们那种摄猎时,他们自然会去自己摸索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或者他们所感知可以去试探的东西。“儿童钞票”现身之前,作为儿童的教育监护引导者干什么去了?如果说我们的感知还落后于儿童,那么就先检讨自己,再去责怪那些制造商和销售者。既然这种违法、有害的印刷品不良玩具出现了,现在不是推卸责任怪制造商和销售者的时候,而是当想办法,采取什么措施去教育引导儿童如实地面对“儿童钞票”的问题,恐怕这才是关键。

观点



「零容忍」,非但让学术造假会失去滋养的土壤,连雨后春笋般的「假冒伪劣」商品,可能也会被扼杀于摇篮之中

「零容忍」,能否前移至基础教育

□ 李泓冰

越是看似神圣的所在,曝出的丑闻也越令人震惊。可是,震惊之后,我们需要问一声“为什么”。

浙江大学曝出的学术造假事件,教育部部长周济说:“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

事件的来龙去脉似乎很复杂,除了造假,还似乎牵涉到企业的商业利益。姑且拂去这些云山雾罩,细细端详一下“学术不端行为”,比照一下此前曝光的一些知名学术造假案例,我们甚至能听暗自的叫屈声。是的,这可能不算是最过分的学术腐败,毕竟他没有全文粘贴,也不是主干部分割窃,只是局部作假。

学术不端的贺博士们叫屈,可能还有这样的话外音:能全怪我们吗?有的学校和老师不是在或明或暗地默许甚至鼓励着我们,在作文中编造动人情节,哪怕有明显的纰漏,也会被老师当成范文,表扬为“合理想象”,以至于中考、高考作文中,母亲病亡、自己如何励志的比例高

得吓人;每逢上级来检查学生减负,有的学校便叮咛学生瞒报作业量、夸大体育锻炼的活动量;至于在升学中,给简历弄点小手脚,多一些“锦上添花”的经历,甚至老师连推荐信的内容看也不看,就署上大名的故事,更比比皆是……

至于不那么明显的造假,更几乎成了孩子们中的潜规则:根本不是发自内心的作文中的假大空思想,被当成拿考场高分的“秘诀”。相反,如果作文中写了真话,上级检查之际不肯为学校圆谎,这个孩子肯定会被视为“行为不端”——不是有一个孩子傻乎乎地在作文中说了“真心话”,表示讨厌春天,因为春天容易流行疾病,便被判为零分吗?

在说“真心话”就意味着“大冒险”的潜移默化中长大的孩子,成年后犯一些如贺博士一般的“不端”,会是很奇怪的事情吗?他们的道德感原本就极其脆弱,才会在些微的名利之诱惑下,一触即溃。

探究“假”花开放的原因,须决然掘开土壤。因此,“零容忍”,更应前移至基础教育。果如此,则幸甚。

教育行政部门,请管住授牌的手

永顺县民族实验学校 张沛宗

时下,不管你走进哪一所学校大门,最醒目的必是一排排“×级示范性学校”、“××明星学校”、“××先进单位”的标牌。校长最引以为豪的一句话就是“我校是×级示范性学校”。

千万别小看了这一块块标牌。它们是学校名气大小的体现,是家长择校的核心要素,是学校软实力的象征,是各级财政换来的宝贝疙瘩。

为了得到这些宝贝疙瘩,学校每年都要花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参与各种各样达标项目建设。劳民伤财且不论,影响最深远的是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为了让有条件的学校先达标,就把有限的财政资金和优秀师资优先投进城镇教学条件本来就比较好

的学校,从而使得城镇的名校更优、农村的普通校更差的城乡教育不公愈演愈烈。导致学校工作围着牌子转,家长择校盯着牌子看。

教育部门出于指导办学的初衷,树立规范性办学的榜样,激发基层学校规范办学的热情,为学校授牌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教育授牌制度严重影响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剧教育不公,其价值取向与基础教育的公平本质背道而驰,值得各级教育管理者好好反思。教育管理者应该发挥自己的管理智慧,认真研究教育管理的本质,勇于担当,锐意改革。教育的公益性决定了不能把鼓励商业竞争的管理方式移植到追求公平的教育管理中来。教育授牌制度导致教育严重不公的后果,是该废除的时候了。

师说